

清代江浙方志东传日本述略

巴兆祥

序

江浙是中国修志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伴随着清代中日书籍交流的频繁,江浙地方志也大量流传日本。地方志是中国独特的文化遗产,珍贵典籍,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中日间的方志交流源远流长,数量众多。清代是其中的一个特别重要时期。江浙作为我国重要的文化之乡,历史上曾编纂了大量的地方志。其历代修志之多,名志之众,修志名家之辈出,独步海内。同样,江浙方志流传日本之多也首屈一指,并在中日方志交流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本文从文献传播学的角度,阐述江浙在清代中日方志交流史中的地位,考述江浙方志东传日本的历史过程、数量及其构成,进而加深对地方志在中日书籍交流史上意义的认识。

一、江浙是清代中国方志东传日本的最重要口岸

江浙地处中国东南,有长江、淮河、京杭大运河、钱塘江等大江大河过境,腹地广阔。东濒大海,与日本为邻。属亚热带季风气候,物产丰富,经济文化发达,沿海多优良港湾,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区域,尤其是与日本的经贸文化往来在中国对外交往史上的地位重要。

清代是中日书籍交流的兴盛时期。中国商船将大量书籍运抵长崎,然后由日本江户幕府设在长崎的“书物改役”进行检查、登录,再进入图书市场,流入各文库。据长崎“书物改役”向井富编纂的《商船载来书目》记载,康熙三十二年到嘉庆八年(日元禄六年至享和三年)的111年间,共有43艘中国商船到长崎港与日商进行汉籍贸易,共运进汉籍4781种¹。“我邦典籍虽富,迩年以来装至长崎已十之七八。”²

地方志是汉籍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一方面是出于贸易考虑,希望通过地方志了解中国的地方特产,以便向中国商人发出需求货物订单。另一方面可能想从中学学习中国地方治理的经验与方法,十分重视输入中国的地方志。对清代输入日本的方志情况,《古渡新渡唐本类书考》有一大概性的描述:“近年来有很多明清书籍舶运至长崎港,其数量难以胜数。我很小的时候游历京师,后改行经营书店已经有二十多年了。我一直在查找国内流传的那些丛书,希望能注上书目卷数、编者姓名,为部分丛书辑录一份书考。……醉墨斋说,上述十五省通志是清康熙年间编辑的。中有先明府志、县志,目次他日再作考证。还有一本《盛京通志》、

¹ 陆坚、王勇主编《中国典籍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杭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32-33页。

² (日)野田笛埴、清客朱劉諸氏《得泰船筆語》卷上,紀藩瓢葉館藏本,関西大学出版部,1986年。

表1 日本江户时代文库收藏方志一览表

收藏者	方志数（部）	资料来源
红叶山文库	589 ⁴	《元治增补御书籍目录》
加贺藩	300	《松云公林家往复书简》
佐伯藩	142	《红粟斋书目》、《佐伯书目》、 《毛利家书目》
德山藩	26	《毛利元次公所藏汉籍书目》、 《德山毛利栖息堂藏书目录》
广岛藩	16	《广岛市立浅野图书馆藏古书目录》
白河藩	14	《松平定信藏书目录》
尾张藩	13 ⁵	《名古屋市蓬左文库汉籍分类目录》
平户藩	8	《（松浦史料博物馆）图书类目录》
水户藩	7	《彰考馆图书目录》
纪州藩	5	《纪州藩文库目录》
伊达藩	4	《宫城县图书馆汉籍分类目录》
彦根藩	3	《（滋贺大学学艺学部图书馆）藏书目录》
大垣藩	1	《大垣市立图书馆汉籍目录》
足柄等县藩	34	《东京书籍馆旧藩藏书之收集》
林家与学问所	52 ⁶	《林家书目》、《昌平学舍书籍目录》
林崎文库	10	《神宫文库图书目录》
木村兼霞堂	5	《内阁文库汉籍分类目录》
南亩文库	3	《南亩文库藏书目》
福田十右卫门	2	《年寄福田十右卫门藏书目录》
高野山释迦文院	4	《内阁文库汉籍分类目录》
中川忠英	3	《内阁文库汉籍分类目录》
古贺精里	3	《（宫内厅书陵部）和汉书分类目录》
河本立轩	1	《内阁文库汉籍分类目录》

一本《畿辅通志》、一本清品级志，总计七百七十四本。”³也就是说，在享保至宽延（即清雍正至乾隆前期）间的日本图书市场上流通着许多志书。根据日本江户时代各文库所藏，清代大约有1232部志书输入到日本（其中输入纪年可考的有1012部）。

由于当时日本实行锁国政策，日本国民不得出海，中日间的方志贸易基本上由中国商人承担。从赴日商船看，从南京、苏州、松江（上海）、扬州、常州、淮安、镇江等港口开出的南京船⁷，乍浦、宁波出发的宁波船，舟山起航的舟山船，福州、泉州、厦门、漳州、台湾、

³ （日）平安書林主人輯《古渡新渡唐本類書考》題言，1751年向榮堂本。
⁴ 其中含4部明末入藏志书。已扣除毛利高翰所献佐伯文库志书。
⁵ 其中含9部明末入藏志书。
⁶ 已減去幕府移給的木村孔恭家旧藏部分。
⁷ （日）木宮泰彥著，胡錫年譯《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648頁。

潮州、高州、广州、海南等地开出的福建省、广东省籍船，都有载运方志的可能。其中，江浙的南京船、宁波船应是最主要的承运商船。

为证明上述观点，我们首先考察载运方志商船的船籍情况。根据现在所能见到的资料，笔者制成了《持渡方志唐船及其船籍一览表》：

表2 持渡方志唐船及其出发地一览表

船主	到长崎年	持渡方志（部）	船籍
	康熙24 贞享2	1	南京
	康熙25 贞享3	1	
	康熙25 贞享3	1	
	康熙34 元禄8	1	
	康熙34 元禄8	1	
	康熙35 元禄9	1	
	康熙38 元禄12	1	
	康熙49 宝永7	1	
程方城	康熙50 正德1	1	南京
费元龄	康熙53 正德4	1	南京
费赞侯 陈抡三	康熙60 享保6	15	南京
潘绍文	雍正1 享保8	10	南京
李淑若	雍正1 享保8	3	南京
丁益谦	雍正2 享保9	2	南京
朱允光	雍正3 享保10	15	宁波
沈人长	雍正3 享保10	7	南京
尹心宜	雍正4 享保11	29	宁波
李亦保	雍正4 享保11	2	广东
	雍正13 享保20	2	宁波
	乾隆4 元文4	1	
唐山辉	乾隆19 宝历4	8	南京
沈敬瞻	乾隆47 天明2	1	南京
	乾隆60 宽政7	16	
	乾隆60 宽政7	1	
	乾隆60 宽政7	31	
	嘉庆8 享和3	4	
	嘉庆8 享和3	1	
	嘉庆8 享和3	2	
	嘉庆9 文化1	1	
	嘉庆9 文化1	1	
	嘉庆10 文化2	1	
	嘉庆10 文化2	7	

陈国振	嘉庆10 文化2	83	
	嘉庆10 文化2	10	
	嘉庆10 文化2	57	
	嘉庆10 文化2	30	
	嘉庆15 文化7	1	
	嘉庆16 文化8	3	
	嘉庆16 文化8	2	
	嘉庆16 文化8	1	
	嘉庆17 文化9	2	
	道光15 天保6或道光16 天保7	6	
沈绮泉	道光17 天保8	1	南京
沈绮泉	道光17 天保8	1	南京
顾子英	道光19 天保10	1	宁波
邵植斋	道光20 天保11	1	宁波
王云帆	道光22 天保13	1	宁波
王云帆 沈萍香	道光22 天保13	1	宁波
顾子英	道光23 天保14	1	南京
	道光25 弘化2	4	
	道光25 弘化2	1	
杨少棠	道光28 嘉永1	1	南京
程子延 陈逸舟	道光29 嘉永2	1	宁波
沈在伯 陶梅江	道光29 嘉永2	2	南京
钮心园 程子延	道光29 嘉永2	1	南京
杨少棠	道光29 嘉永2	1	南京
江星畬 钱少虎	道光29 嘉永2	2	宁波
杨少棠 顾子英	咸丰1 嘉永4	1	南京
杨少棠 陶梅江	咸丰2 嘉永5	4	南京
江星畬 钮春杉	咸丰2 嘉永5	1	南京

资料来源：《宝历三年八丈岛飘着南京船资料》、《唐船持渡书物目录留》、《百舌草茎》、《琼浦杂缀》、《琼浦又缀》、《圣堂文库赋役府县志目录》、《安永九年安房千仓飘着南京船元顺号资料》、《享保二十年第二十番宁波船资来目录》、《舶载书目》、《商舶载来书目》、《唐船进港回棹录》、《江戸时代唐船持渡书研究·资料编》、《江戸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

据表2可见,持渡方志的中国商船见之于记载的十分稀少,仅60艘,其中有船籍记录的更少,只有30艘。这30艘船中,除1艘广东船外,南京船有20艘,宁波船9艘,也就是说,由江浙驶往日本的船只持载运方志的比例远远高出其它地方的商船。

由于清代输往日本的方志遍及中国各地,而现有资料明确记载有船籍的持渡方志商船又十分稀少,对论证上述问题有一定的局限性。为更有说服力,这里再考察中国各地商人是怎样到日本长崎的。西川如见《增补华夷通商考》是一本总结明末至清康熙三十四年间中日贸易的著作,记载了中国15省的户口、风俗、土产、至长崎的道里,还特别标记了当时中国各地商人是以什么样方式前往日本的。沿海的南京、浙江、福建、广东省商船可以直通长崎,如⁸:

南京省 来长崎的船并商人最多。

唐船出发地:苏州府、松江府、扬州府、常州府、崇明县、淮安府、镇江府、应天府
商人来自:凤阳府、安庆府、太平府、庐州府、徽州府、广德府、和州、徐州府、滁州、宁国府、池州府

浙江省 因在海边,津港多,故来日本的船最多。

唐船出发地:宁波府、台州府、温州府、杭州府、舟山、普陀山

长崎商人来自:嘉兴府、湖州府、金华府、严州府、衢州府、处州府、绍兴府

内地省的商人,如河南省,“非在海边,故商人多搭乘南京船来。”湖广省,“非在海边,商人搭乘南京、福州船到长崎。”其它北京、山东、山西商人搭乘南京船,陕西、江西商人搭乘南京、福州船,广西商人搭乘广东、泉州船,云南商人搭乘广东、漳州、福州船,贵州、四川商人搭乘广东、福州、南京船。据此可知,清康熙三十三年(日元禄七年)前内地商人多通过南京船、福州船、漳州船、广东船,主要是南京船,前往日本。到康熙五十四年(日正德五年),日本实施“正德新令”,规定到日中国商船年限额30艘,其比例为中国本土的南京船10艘、宁波船11艘、厦门船2艘、台湾船2艘、广东船2艘⁹。福建船、广东船较以往大大减少,江浙船占据绝对优势,这样到长崎贸易的中国各地商人大多都搭乘江浙船。再从商船上运载的方志看,如雍正三年(日享保十年)已六番宁波船运去的志书有山西的《山西通志》、盛京的《盛京通志》、陕西的《陕西通志》、山东的《山东通志》、江苏的《江南通志》、浙江的《浙江通志》、江西的《江西通志》、福建的《福建通志》、河南的《河南通志》、湖北的《湖广通志》、广东的《广东通志》、广西的《广西通志》、四川的《四川通志》、贵州的《贵州通志》、云南的《云南通志》。由此进一步说明,不仅江浙方志,而且内地相当部分方志,多是由来自各地的船员或搭乘商人购买、携带,集中于江浙船只,而后贩运至日本。江浙成了清代对日方志贸易最重要的口岸。

二、清代江浙方志东传的历史过程

明清两代是江浙地方志的兴盛时期。在中央政府的号召下,江浙各地的地方志书每有编纂。如洪武十年,中宪大夫广东张度来守常州,“下车之初,适朝廷命天下郡县纂修志书,

⁸ (日)西川如见《增补华夷通商考》洛陽書林甘節堂、學梁軒1709年刊行。兹选取部分省以说明记载了中国商人的出发地。

⁹ (日)大庭脩著,徐世虹译《江户时代日中秘话》中华书局,1997年版,25页。

于是会集耆宿之士，稽今订古，博采见闻，撰次成帙。”¹⁰弘治五年，“应天府移文属邑类修郡志。”¹¹嘉靖元年，“分遣进士往天下藩臬采取民风节义，凡《一统志》所关者，莫不广求博载。”¹²三年，姚鸣澐纂修成（嘉靖）《淳安县志》。康熙三年，扬州知府雷应元“移檄十属长，并致札于十属之司铎，俾延集其地之矜士谙典故者，胪列其六十年沿革建置，美迹芳风，种种未缀志书者”，编纂《扬州府志》¹³。十一年，康熙“上谕纂修通志，江南十百郡邑，在奉命不敢后。”¹⁴雍正七年，朝廷“命直省各督抚纂修通志，上之史馆，汇纂本朝《一统志》，以昭一道同风之盛。”当时李卫“以总督管巡抚事，备员浙省。闻命之下，哀罗典籍，礼儒绅，设馆授餐，矢公矢慎。”一年余，（雍正）《浙江通志》脱稿¹⁵。乾隆十年，纳兰常安任浙江巡抚，“甫下车，即取览省志。……檄视诸郡邑乘，则有芜蔓未知裁者，有简稽失其详者，且多残缺失次、漫漶不可句读者，急饬修整。”¹⁶乾隆十五年，江苏省“檄郡县有司，厘订各邑志书，以备士训氏、诵训氏采择，”¹⁷于是如皋、通州等志相继成书。

据不完全统计，明清两代江浙共修有志书约1037种，其中，明代江苏121种，浙江118种；清代江苏425种，浙江373种¹⁸。所修志书遍及江浙各府州县，甚至各乡镇也多修有志书。正如马受曾（雍正）《象山县志序》所云：“我国家德化隆盛，车书大统，户口幅员振古莫逮。馆阁硕儒编辑《一统志》，以鸣太平修养、千载一时之盛。而封疆大吏亦各飭僚属，于供职之暇蒐订乘志，以备石渠、天禄之采择。且以见德广思溥，虽偏隅下县，莫不有纪载也。”¹⁹江浙方志的大量编纂、出版为方志输出日本提供了充足的货源。

江浙方志东传日本可以追溯到唐代。《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记载，当时有《扬州图经》、《海州图经》等江浙志书在日本流传。此后，也始终不辍，但数量较多地输出日本是在明末至清咸丰间，即日本的江户时代。清代江浙方志输出日本大体经历四阶段：

第一、以明代方志为中心期（顺治二年至康熙五十年）。据《御文库目录》记载，清代首部输入日本的江浙方志是王鏊（正德）《姑苏志》。其后，顺治九年输入《吴兴掌故集》、《义乌县志》，顺治十二年输入《杭州府志》、《衢州志》，顺治十三年输入《温州府志》，顺治十四年输入《浙江通志》，顺治十七年输入《扬州府志》、《常州府志》、《宜兴县志》、《江都志》。到康熙二十三年，清廷废除禁海令，允许沿海商船出海贸易。康熙二十七年，江浙方志输出到日本出现一个小高潮，有《淮安府志》、《徐州府志》、《湖州府志》、《严州府志》、《杭州府志》、《嘉兴府志》、《绍兴府志》、《青浦县志》、《兰溪县志》、《山阴县志》等16部志书被唐船携带到日本²⁰。迄康熙五十年，有明确纪年这一时期输出到日本的江浙方志有41部，其中通

¹⁰ （成化）《重修毗陵志》，谢应芳《毗陵续志序》。

¹¹ （弘治）《句容县志》，王韶后序。

¹² （嘉靖）《淳安县志》，姚鸣澐《重修淳安县志引》。

¹³ （康熙）《扬州府志》，雷应元序。

¹⁴ （康熙）《通州志》，王宜亨序。

¹⁵ （雍正）《浙江通志》，李卫序。

¹⁶ （乾隆）《平湖县志》，纳兰常安序。

¹⁷ （嘉庆）《如皋县志》，旧序，郑见龙序。

¹⁸ 巴兆祥《方志学新论》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76页。仓修良《方志学通论（修订本）》方志出版社，2003年版，第339页。《中国地方志目录·上海市》中华书局，1985年版。统计数指现存数。

¹⁹ （乾隆）《象山县志》，卷十一。

²⁰ （日）大庭脩整理《元禄元年唐本目錄》，《史泉》35、36号合刊，1967年12月。

志2部、府志14部、县志25部;以区域计,江苏16部、浙江25部,以浙江为多;年均输出约0.62部,府志占41%,比例相对较高。将这些方志对照日本红叶山等文库所藏,发现基本上都属于明代方志。

第二、以康熙方志为中心期(康熙六十年至雍正十二年)。康熙五十五年(日享保元年),纪州藩主德川吉宗继任第八代幕府将军。他嗜好书籍,注意从地方志等汉籍中学习各种知识。“他常召集御侧、小姓、小纳言等,让他们搜索书籍。……他并不特意寻找诗赋、文章之类的书籍,而是专门搜集对辅国佐政有益之书,比如那些记载了中国情况的府州县志。”²¹不仅如此,他还常常调阅红叶山御文库藏的地方志,特别是其中的江浙地方志。如康熙六十年(日享保六年)四月二十日,吉宗借阅了《应天府志》、《杭州府志》、《温州府志》、《衢州府志》、《常州府志》、《扬州府志》、《江都志》、《上海县志》、《浙江通志》、《普陀山志》等江浙方志²²,次年三月九日,调阅了《浙江通志》、《杭州府志》,九月二十五日又借阅《浙江通志》、《乌程县志》、《扬州府志》²³。

正因日方表现出对江浙方志的强烈需求信息,中国商船也就特别注意输出江浙方志,如:雍正三年(日享保十年)已六番船运去了(康熙)《江南通志》一部六套、(康熙)《浙江通志》一部六套,雍正四年(日享保十一年)午二番船持渡了(康熙)《邳州志》、(康熙)《江浦县志》、(康熙)《睢宁县志》、(康熙)《高邮州志》、(顺治)《徐州志》、(康熙)《六合县志》、(康熙)《桃源县志》、(康熙)《清河县志》、(康熙)《赣榆县志》、(康熙)《萧县志》、(康熙)《句容县志》、(万历)《沛志》、(康熙)《宿迁县志》、(万历)《盐城县志》、(康熙)《台州府志》、(康熙)《淮安府志》、(康熙)《仪真县志》、(康熙)《沭阳县志》、(康熙)《溧水县志》、(顺治)《丰县志》、(顺治)《海州志》、(万历)《江都县志》、(康熙)《浦江县志》、(崇祯)《泰州志》、(康熙)《余杭县志》、(康熙)《余杭县志新志》、(康熙)《重修扬州府志》²⁴,江浙方志对日出口呈现出快速发展态势。据现有资料不完全统计,康熙六十年至雍正十二年间,输入日本的江浙方志约有136部,年均达10.46部,比前一期大大增多。其中,江苏59部,浙江77部,浙江继续保持领先。以种类计,通志6部、府志21部、州志10部、县志98部、乡镇志1部,较前一期增加了州志、乡镇志,县志成了输出的主要志书,比重达到了72.06%。具体输出情况,详见表3《德川吉宗时期输入江浙方志分类统计表》。这136部志书中能考订属于康熙间编纂或印刷的志书大约有86部,占此时段中国商船持渡江浙方志总数的63.24%。

第三、以乾隆方志为中心期(乾隆十五年至嘉庆十二年)。雍正十三年至乾隆十四年(日享保二十年至宽延二年)未见有江浙方志输出。乾隆十五年后,江浙方志又断断续续对日出口。如乾隆十九年(日宝历十年)输出(万历)《续修严州府志》、(乾隆)《吴县志》,乾隆三十年(日明和二年)输出《南畿志》、《姑苏志》、《江南通志》、《浙江通志》。乾隆四十七年(日天明二年),日著名方志收藏家佐伯藩主毛利高标从寅十番船上购买《江山县志》²⁵,开始了他大量收购地方志的生涯。次年,购进江浙《嘉禾志》十二本、《江宁府志》四十八本、

²¹ (日)《有德院殿御實紀附録》卷十,吉川弘文館,1982年版。

²² (日)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大日本近世史料·幕府書物方日記》第三册,東京大学出版会,1966年版,128-129页。

²³ (日)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大日本近世史料·幕府書物方日記》第四册,1967年版,25页,158页。

²⁴ 《舶載書目》,卷二十二,関西大学東西學術研究所,1972年版。

²⁵ 王勇、大庭脩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典籍篇》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155页。

表3 德川吉宗时期输入江浙方志分类统计表

种 类			通志	府志	州志	县志	乡镇志	合计
纪 年								
康熙60	享保6	1721	2	4		3		9
康熙61	享保7	1722		1				1
雍正1	享保8	1723		1	1		1	3
雍正3	享保10	1725	2	7	4	24		37
雍正4	享保11	1726		5	4	48		57
雍正5	享保12	1727		1		6		7
雍正6	享保13	1728		1		10		11
雍正7	享保14	1729				1		1
雍正9	享保16	1731				1		1
雍正11	享保18	1733	2	1		5		8
雍正12	享保19	1734			1			1
共计			6	21	10	98	1	136

资料来源：《商船载来书目》、《舶载书目》、《幕府书物方日记》等

《秀水县志》十二本²⁶。大体同时，除红叶山御文库继续购进江浙方志外，林衡、中川忠英、大田南亩、木村孔恭、松平定信等藏书家也多对购藏江浙方志感兴趣，再加上乾隆五十九年（日宽政六年）幕府规定，中国商船乘员携带的非订购之商业书籍，经特别批准后可以进行交易，大大提高了中国商船输出江浙方志的积极性，江浙方志出口迎来又一个高潮期。如乾隆六十年（日宽政七年）输出《青浦县志》、《秀水县志》、《句容县志》等12部，嘉庆八年（日享和三年）输出《宝山县志》、《兰溪县志》等7部，嘉庆九年（日文化元年）输出《开化县志》、《分水县志》等9部，嘉庆十年（日文化二年）达到顶峰，共有《重修崇明县志》、《苏州府志》、《温州府志》、《海宁县志》等42部被舶载长崎。

这一时期的江浙方志出口尽管数量不及前一期，约91部，年均1.63部，但却表现出不同的特点：①输出的志书从元到清嘉庆都有，其中，能考订属于乾隆编纂或印刷的志书大约有39部，占42.86%，数量最多；康熙方志17部，占18.68%，退而居其次；明代方志11部，占12.09%，又次之。②从出口构成看，江苏方志56部，浙江方志35部，江苏首次超过浙江成为江浙对日方志出口的主体。通志（7部）、县志（68部）占出口总量的比重稳步提高，而府志（13部）稍有下降，州志（2部）则大幅度下滑。

第四、以乡镇志为主期（道光十七年至三十年）。到嘉庆、道光（日文化、文政）之际，日本江户时代文化发展进入总结阶段，幕府设置了三史局，开展编修《德川实纪》、《地志物产部》等大型文化事业，注重的是利用方志而非购买。佐伯藩、德山藩停止了方志收购，红叶山御文库也于道光十六年（日天保七年）整理了方志库藏，以为清代方志收集已基本齐全。日本方志需求的大幅降低预示着清代对日方志出口即将步入尾声。在这样的背景下，江浙方志对日输出也沉寂下来，迄道光三十年（日嘉永三年）仅有9部出口，通志、府志已绝迹，

²⁶ （日）立原東軒《見聞書目・毛利侯長崎調進書目》抄本，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

州志、县志也只有1部和3部，但乡镇志却有5部，占了55.56%。就区域而言，浙江仅出口《海盐县图经》1部，其余全是江苏志书。

三、输日江浙方志的数量及其构成

清代，江浙有多少方志输出到日本呢？笔者据《舶载书目》、《商舶载来书目》、《琼浦又缀》、《自文化三年至文政五年新收书目》、《御文库目录》等进行不完全统计，大约有277部，包括江苏139部、浙江138部。以种类计，则通志15部、府志48部、州志13部、县志194部、乡镇志7部。其纪年输出区域、种类构成如下：

表4 清代输日江浙方志分区统计表

舶载时间			江苏省	浙江省	合计
清纪年	和纪年	阳历			
顺治2	正保2	1645	1		1
顺治9	承应1	1652		2	2
顺治12—14	明历1—3	1655—1657		4	4
顺治15—17	万治1—3	1658—1660	5		5
康熙27—40	元禄1—14	1688—1701	9	19	28
康熙50	正德1	1711	1		1
康熙60—雍正12	享保6—19	1721—1734	59	77	136
乾隆15	宽延3	1750	1	1	2
乾隆19	宝历4	1754	1	1	2
乾隆30	明和2	1765	3	1	4
乾隆47—48	天明2—3	1782—1783	1	4	5
乾隆60	宽政7	1795	9	3	12
嘉庆8	享和3	1803	1	6	7
嘉庆9—12	文化1—4	1804—1807	40	19	59
道光17—23	天保8—14	1837—1843	3	1	4
道光25	弘化2	1845	1		1
道光28—30	嘉永1—3	1849—1850 ²⁷	4		4
共 计			139	138	277

上述的277部是有纪年可考的，如果加上纪年难考的，如加贺藩藏（万历）《镇江府志》、（崇祯）《松江府志》，德山藩藏（康熙）《松江府志》，佐伯藩藏（崇祯）《嘉兴县志》、（康熙）《松江府志》，中川忠英藏（顺治）《湖州府志》，等等，数量还会有所上升，不过就已掌握资料看，增加的数量会有限。估计清代输日的江浙方志数量大体在300部左右。

从有舶载纪年的方志看，清代输日江浙方志占清代中国出口日本方志总数的27.37%，

²⁷ 《昆山新阳志》申四番船带去，嘉永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进港，即阳历1849年1月23日。

表5 清代输日江浙方志种类统计表

舶载时间			通志	府志	州志	县志	乡镇志	合计
清纪年	和纪年	阳历						
顺治2	正保2	1645		2				2
顺治9	承应1	1652		1		1		2
顺治12—14	明历1—3	1655—1657	1	3				4
顺治15—17	万治1—3	1658—1660		2		3		5
康熙27—40	元禄1—14	1688—1701		7		21		28
康熙50	正德1	1711	1					1
康熙60—雍正12	享保6—19	1721—1734	6	21	10	98	1	136
乾隆15	宽延3	1750	2					2
乾隆19	宝历4	1754		1		1		2
乾隆30	明和2	1765	3	1				4
乾隆47—48	天明2。3	1782—1783		3		2		5
乾隆60	宽政7	1795	2			10		12
嘉庆8	享和3	1803				7		7
嘉庆9—12	文化1—4	1804—1807		8	2	48	1	59
道光17—23	天保8—14	1837—1843			1	1	2	4
道光25	弘化2	1845					1	1
道光28—30	嘉永1—3	1849—1850				2	2	4
共 计			15	48	13	194	7	277

资料来源：《舶载书目》、《商舶载来书目》、《琼浦又缀》、《琼浦杂缀》、《自文化三年至文政五年新收书目》、《享保拾八年癸丑长崎售书并新渡书目》、《宝历三年八丈岛飘着南京船资料》、《元禄元年唐本目录》、《尾张德川家藏书目录》、《壬寅入津唐本大意书抄》、《御文库目录》、大庭脩《江户时代唐船持渡书研究·资料编》、大庭脩《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等。

要远远高出输日方志较多的山东、安徽、江西、河南、福建、广东等省。江浙方志流传日本之所以多，除了江浙方志事业发达、修成的志书数量众多以外，最主要的原因有二：一是清代对日贸易的重要港口多在江浙两省，中国商人在江浙两省出发港及其周边市场上就近收集江浙方志相对比较方便，自然江浙方志被舶载的就较多。如康熙六十年（日享保六年）丑三十番南京船舶载方志15部，涉及7个省，其中江浙方志有《重修扬州府志》、《常州府志》、《吴江县志定本》、《嘉兴府志》、《归安县志》、《乌程县志》等6部，占了40%。雍正四年（日享保十一年）午二番宁波船携运的3个省29部方志当中就有《徐州志》、《淮安府志》、《丰县志》、《浦江县志》、《余杭县志》等江浙方志27部，占全部的93.1%。换言之，只要南京船、宁波船的商人愿意，就能在起航地及其附近收集到日方所需的江浙方志。日本学者大庭脩先生说：“江苏省的地方志主要由来自上海的南京船载入，浙江省的则来自宁波、乍浦的宁波船载入。”²⁸ 尽管有些过于绝对，但与事实出入也不是很大。

²⁸ 《江户时代日中秘话》，112页。

二是日方的需要。清代中日货物贸易相当发达，中国从日本进口的主要是铜，还有银、部分海产品（如海带、鲍鱼、鱼翅等），日本从中国输入的则很多，有生丝、丝织品、棉织品、药材以及砂糖、矿物、染料、涂料、皮革、纸、墨、笔、扇子、茶、书籍等。江浙是清代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物产丰富，出产的湖丝、刺绣、棉织品、茶叶、湖笔、扇子等闻名天下，且距离日本又较近，从经济成本角度考虑，江浙产物品应是日方首选。日本从江苏输入的商品有：书籍、綾子、纱綾、绉纱、綾机、罗、纱、紵、闪缎、云绡、锦、裹绡、金缎、五丝、柳条、裱褐、金线木棉、绢口、木棉、綾木棉、縞绵、布、丝线、书翰纸、扇子、箔、线香、针、栲篋、香袋、造花、茶、铸器、锡器、漆器、茭实、槟榔子、檀香、芍药、黄精、何首乌、海螵蛸、紫金锭、蜡药、花石、纸偶人、角制工艺品、皮文卷匣、绣品、书画、古董、药种等，从浙江省输入的商品为：白丝、绉纱、綾子、綾机、纱綾、云绡、锦、金丝布、葛布、毛毡、绵、罗、裹绡、茶、纸、竹纸、扇子、笔、墨、砚石、瓷器、茶碗药、漆、胭脂、方竹、冬笋、南枣、黄精、茭实、竹鸡、红花木犀、附子、药种等²⁹。对这些商品货物的产地及其品性，江浙方志多有记载。日方出于为输入江浙货物提供参考，当然需要多多进口江浙方志。

当时的中国商船持渡方志比较散，对江浙方志的船载同样如此。大多数贩运志书的船只载一、二部，如康熙三十四年（日元禄八年）亥二十一番夏船载《江阴县志》1部，康熙五十年（日正德元年）卯五十一番船南京船载《江南通志》1部，嘉庆十年（日文化二年）丑贰番船载《南汇县志》、《苏州府志》2部。只有极少数船数量稍多，如乾隆六十年（日宽政七年）卯五番船运去《娄县志》、《青浦县志》、《秀水县志》等8部，嘉庆十年（日文化二年）丑五番船运去《无锡县志》、《温州府志》、《吴郡甫里志》、《崇明县志》等16部，丑七番船运去《昆山新阳合志》、《续修南汇县志》、《扬州府志》等22部。

既然是书籍贸易，就必然有价格问题。有关江浙方志的日方输入价，记载很少，但通过相关资料的爬梳，还是有些发现。嘉庆九年至十年（日文化一年至二年）在长崎任职的大田南亩曾有记录³⁰，如：

子六番外船（引者注：嘉庆九年 文化元年）《苏州府志》 六十匁
日国立公文书馆藏《购来书籍目录》也记载：

酉三番船（引者注：道光十七年 天保八年）《南翔镇志》 七匁

亥四番船（引者注：道光十九年 天保十年）《海盐县图经》 拾五匁

据中泽弁次郎《日本米价变动史》记载的文化元年米价一石折55匁、天保八年米价一石折172.25匁、十年米价一石折92.6匁了换算，《苏州府志》出口价相当于1.09石大米，《南翔镇志》的出口价相当于0.04石大米，《海盐县图经》的出口价相当于0.16石大米，可见清代江浙方志的出口价是随市场状况而起伏的。

总之，由于江浙处于清代对日交往的前沿，在中日地方志贸易大发展的背景下，在中国商人、日本幕府、藩主、大名、学者等多方的努力下，江浙地方志的对日出口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地方志的交易，不仅满足了中日双方的需求，而且还扩大了江浙方志的流传范围，对提高江浙在日本的影响也有相当大的帮助。

²⁹ 《增補華夷通商考》卷一、卷二。

³⁰ 详见拙文《17-19世纪中叶中日书籍交流史的经济分析：以地方志为例》，《清史研究》2008年2期。